

G20 應在國際戰疫中發揮關鍵作用



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G20 領導人視頻特別峰會昨日召開，重點討論如何應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和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此次特別峰會。輿論認為，在全球疫情肆虐，世界處於至暗時刻的特殊背景下舉行的 G20 特別峰會，是國際社會在疫情發生後採取的首次重大聯合行動，具有特殊而又重大的意義。

新冠肺炎疫情來勢兇猛，病例和死亡人數都在激增，世界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已有將近 200 個先後「淪陷」。全球一片恐懼，世界各行各業陷入危機，多國經濟遭受重創，國際金融市場急劇動盪，世界旅遊業窒息，很多地方的城市成為了「鬼城」，民眾生活困難，很多人焦慮不安，感到極度痛苦。

各國各自為戰產生矛盾

就經濟衝擊而言，此次疫情已經超過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及此後的歐債危機；就社會危害而言，疫情帶來了全面恐慌，造成了人人自危，人們的工作、生活和社交方式全面改變。世衛組織和歐美醫學發達國家都在日夜兼程，合作研發抗毒疫苗，但最樂觀的消息也要一年以後才有可能投入使用。

當前，全球的疫情防控基本上各自為戰，也因此產生了很多問題和矛盾。疫情之下，各種次生災害在不斷發生，包括大量人員失業、企業倒閉、債務違約、股市暴跌、學生停學等各種問題。旅遊禁令的實施，導致世界各國變成孤島。生產與交通物流的中斷造成多國產業鏈和供應鏈中斷。很多國家的醫療資源和醫護人員嚴重短缺，各種險情和警報

在世界各地拉響。有的國家當局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為保經濟不顧人命；有的國家疫情管控鬆弛垮垮，危害他國。

此時此刻，國際社會急需直面危機，同舟共濟，果斷決策，加強應對，形成合力，克服散亂。上周，西方七個工業發達國家（G7）召開了應對新冠疫情視頻會議，但 G7 的代表性遠遠不夠，因而並未產生多大的影響和實際效果。

此次舉行 G20 特別峰會，顯然更有利於全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一是 G20 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G20 既包括了 G7 成員國，也包括了金磚國家和「新鑽國家」在內的世界新興經濟體，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G20 成員國的人口佔全球三分之二多，面積佔 60% 以上，國內生產總值約佔全球的 85%，貿易額約佔 80%，對世界經濟社會的重要性和穩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據宣佈，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的負責人，以及東盟輪值主席國越南、非盟輪值主席國南非、海合會輪值主席國阿聯酋和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輪值主席國盧旺達等國領導人，都將參加此次 G20 特別峰會，使此次峰會的代表性、權威性和號召力更大。

二是 G20 負有應對國際重大危機，加強全球治理的使命責任，並有相當的成功經驗。G20 誕生於 1999 年亞洲金融危機，最初是成員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論壇，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催生下升格為元首級峰會，至去年六月的日本大阪峰會，G20 已舉辦了 14 次峰會。G20 是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補充、加強和完善，2008 年為遏制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和協調大國經濟金融政策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應體現政治和道義擔當

近年來，G20 一方面不忘初心，發展成了世界主要經濟體領導人定期商討世界經濟大勢和尋求應對之道的首選平台，同時又與時俱進，將關注點延伸到了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數字技術和國際稅收合作等更為宏大和長遠的全球議題。此次疫情既是全球重大的公共衛生安全危機，也是由此引發的全球政治、經濟、貿易和安全危機，彼此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如果 G20 能以此次特別峰會為契機，加強團結和應對協調，將使 G20 的職責、使命得到重大創新和擴展。

三是 G20 的機制靈活，操作方便。G20 既沒有常設領導機構，也沒有秘書處，但由成員國輪流擔任

主席國。各成員國都非常看重這一機會，各展所長，積極努力表現，以提升其在 G20 乃至國際上的形象和影響力。沒有秘書處的 G20 減少了很多繁文縟節和文牘主義，峰會的出席人員、出席人數和議題也更加靈活，可以直奔主題，聚焦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並更有可能拿出行動方案。此次特別峰會還特別邀請了約旦、新加坡和瑞士三國的領導人參會，便是 G20 機制靈活的一種表現。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際召開的此次 G20 特別峰會，需要討論的問題重大，既有加強全球防控疫情的宏觀問題，也必定會涉及當下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一系列緊迫問題，包括加強疫情防控的合作協調，加強疫情資訊的透明和共享，加強醫療資源的合理調劑，加強緊急醫療支援，加快疫苗的研製和防護設備用品的生產等。如何加強疫情期間各國經濟、金融、貨幣政策的協調，加強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加強貿易的暢通和避免實施不必要的貿易禁令等，無疑是與會各方的重點關注。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呼籲與會領導人，尤其是二十國集團的領導人能加強合作，團結應對，彰顯責任，體現政治和道義擔當，出台強有力的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的大流行。

縱暴派又拋「政治檢控論」包庇鄭麗琼

傅健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副主席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在 3 月 26 日，警方拘捕中西區區議會主席、民主黨區議員鄭麗琼，她涉嫌觸犯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的第 9-10 條的「作出煽動意圖作為罪」，她在中午獲准以一萬元擔保離開警署。縱暴派政客馬上撲出來，為她開腔護航，聲稱該法律自 1971 年最後修訂以來從未使用，而且定義範圍廣泛，「明顯以言入罪之虞，亦和某些現行較輕罪行重疊，變相提高最高定罪」。更有熟悉保安事務的執業律師兼立法會議員指警方引用「煽動謠言罪」拘捕她，是「引用殖民統治的惡法，明顯是政治檢控」。

以「煽動意圖罪」起訴並非過時無效

筆者認為所謂「用回歸前惡法起訴，是政治打壓」的指控，完全欠缺理據、事實和法律基礎支持。眾所皆知，《刑事罪行條例》是香港其中一部行之有效的法律，共有 161 條的條文和附表 1-2 清晰地規範不同的刑事罪行，完全沒有含糊的地方。回歸前適用的法律一直沿用到現在，沒有人被起訴其中一項條文，並不表示這些條文失效，根本不存在違法違憲的問題。

縱暴派政客們以「以言入罪」、「煽動謠言罪」、「法律過時或不適用」等藉口，純粹是謬論，只是重施故伎，顛倒是非，誣導市民，向特區政府施壓，企圖為鄭麗琼開脫刑責。

警方表示，過去見到有人在社交媒體，非法發佈警務人員以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包括警員編號、地址和電話等，並發佈煽動暴力和仇恨言論。警方強調，拘捕行動只是針對違法行為，而非針對任何人的背景及工作，案件仍在

調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提醒市民高院針對警員起底的禁制令仍然生效，在網上作出起底行為屬違法，而發佈煽動的言語及鼓吹暴力，亦會觸犯其他刑事罪行。

縱暴派政客無法無天，政治凌駕法治，刻意違反法庭頒發的禁制令，把警察和其家人「起底」放上網，並發佈煽動暴力和仇恨言論，這是挑起仇恨，企圖撕裂社會，破壞社會安寧，導致該資料的當事人和家人蒙受心理傷害，除了「藐視法庭」，更可能觸犯：

(1)《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64 條的「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的罪行罪」，最高可處罰款一百萬元及監禁五年；

(2)《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意圖罪」，最高可處監禁三年。

回歸後，根據第 1 章《釋義及通則條例》，英女皇改為香港特區政府。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9 條的規定，煽動意圖是指意圖：

(1)(a)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皇陛下本人、其世襲繼承人或其他繼承人，或香港政府，或女皇陛下的領土其他部分的政府，或依法成立而受女皇陛下保護的領域的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

(b)激起女皇陛下子民或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使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

或(c)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或

(d)引起女皇陛下子民間或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或

(e)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

敵意；或

(f)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g)慫恿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2)任何作為、言論或刊物，不會僅因其有下列意圖而具有煽動性：

(a)顯示女皇陛下在其任何措施上被誤導或犯錯誤；或(b)指出依法成立的香港政府或香港憲制的錯誤或缺點，或法例或司法的錯誤或缺點，而目的在於矯正該等錯誤或缺點；或(c)慫恿女皇陛下子民或香港居民嘗試循合法途徑促使改變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或(d)指出在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產生或有傾向產生惡感及敵意的事項，而目的在於將其消除。

鄭麗琼不能凌駕法律

另外，根據第 10 條的規定：

(1)任何人(a)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煽動意圖的作為；或(b)發表煽動文字；或(c)刊印、發佈、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或(d)輸入煽動刊物(其本人無理由相信該刊物屬煽動刊物則除外)，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5,000 及監禁 2 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 3 年；煽動刊物則予以沒收並歸予官方。

(2)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管有煽動刊物，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2,000 及監禁 1 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 2 年；該等刊物則予以沒收並歸予官方。

法治、民主、自由和司法獨立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基本法保障市民的人權和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絕對沒有政治檢控。

香港防疫打足全場

鄧咏駿 新青年論壇召集人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因為病毒沒有眼、沒有意識形態、沒有階級觀念，特別「公平」，它的到來使人類社會的短板——暴露，也正好檢驗不同社會的治理能力。疫情發生至今，中國內地打上半場，西方打下半場，香港打足全場。

中國內地在上半場暴露了個別地方官員危機意識不足的問題，鍾南山更直言中國疾控中心地位太低，要檢討衛生管理制度。西方社會打下半場，一個個發達國家之前做了兩個月「評述員」，浪費了兩個月的熱身、檢視裝備及體能的時間，結果一落場就跌腳受傷。更讓歐美措手不及的是疫症暴露了體制問題，貧富、種族、世代之間巨大矛盾分裂社會，原來的普世價值都不見了，富人政客沒病徵也有特權可以隨時檢測，有病徵的平民只能回家自我隔離；政府為了掩蓋抗疫不力，只能以種族矛盾轉移視線；年輕人要自由玩樂，更大肆舉行疫症派對。歐洲回過神後，輿論與政府開始反思不足，學習、請教中國抗疫模式。

香港在上半場，反中亂港勢力借抗疫興風作浪，既與西方社會一道作壁上觀，也很悲壯地要醫護罷工救港，死諫要全面封關，但只封內地口岸、內地人及內地港人，食肆寫明只招待港人，香港土生中醫大字標明不診治到過內地疑似發燒的人，居民破壞隔離中心及定點診所。中場休息，香港疫情緩慢發展，康文署重開場地，醫管局重新排上非緊急手術，香港人認為自救成功，沒有檢討上半場抗疫的盲點及論述的失德之處。到下半場，歐美淪陷，部分香港人一邊幫忙開脫，一邊接回在歐美的寶貝子女回港，當歐美失控求中國派外援時，當歐美回港確診個案急增時，香港的政客、醫護、專業人士患上了失語症。現時醫院的防護物資充足嗎？不！個案急增，口罩、防護衣都不夠，醫生要用病人袍做後備，醫護壓力大，罷工救港的工會卻失語了。食肆標明因防疫只招待港人，一個個港人留學生回港四出覓食，老闆員工都失語了。香港土生中醫的診所門上「不診治到過內地疑似發燒的人」，與診所內「懸壺濟世」、「仁心仁術」的牌匾形成巨大反差。

下半場還未完結，香港還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還看香港人剩下多少自省能力。

吳子倫 雲浮市青聯委員 中華文化傳承交流聯合會政策研究委員會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全球經濟陷入衰退，香港當然難以倖免。經過 2019 年的動亂日子，餐飲及零售業本來已經遍體鱗傷，今次的疫情進一步令商戶生意減少，停業、結業的餐廳超過 80 家，大量從業員需要放無薪假。對金融地產行業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11 間本地證券行相繼倒閉，近 100 家地產代理行停業，情況讓人擔憂。

雖然全球多國已實施封關措施，但疫情未見受控，不少海外港人均設法回港，導致香港近日染病人數持續攀升。據筆者觀察，商場出現了很多外出消費的市民。市民對防疫逐漸鬆懈，香港未來 2 星期有疫情大爆發的風險。有專家指出，出現數千宗個案並非不可能。疫情大爆發將會引發更多企業倒閉，使失業率急升，市民消費意慾繼而減少，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在這個嚴峻的局面下，黑暴在過去的周末再次以追究「7·21 元朗事件」為藉口，在元朗一帶聚集堵路及投擲汽油彈，為社會添亂。倘若社會放任他們不管，將會再次嚇怕市民不敢外出。黑暴對政見不同的商戶進行破壞，必然令企業雪上加霜。他們令人髮指的行徑只是擾亂社會秩序，胡亂發洩情緒，特區政府必須嚴打，逮捕這些違法人士。

黑暴繼續破壞社會，而議員着眼於政治爭執，只會令市民生活困苦不堪。對廣大市民而言，得到一個安穩的生活環境才是他們的終極願望。香港已經沒有本錢繼續爭執，社會各界必須拋開成見，專注合作抗疫，讓香港度過這場百年一遇的危機。



專注合作抗疫共度危機

食品供應鏈脆弱是英國最大麻煩

裴軍運

疫情在歐洲傳播之快，死亡數量之高，令起初對疫情重視不足的英國政府慌了神，連忙剎車掉頭，放棄了那個人人見人怕的「群體免疫」策略，繼而放出一招，四處撒錢，一面抗疫，一面拯救英國的商業與經濟，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政府代企業主支付僱員 80% 的工資。財政大臣辛偉誠為此政策甚至有點自豪，他宣佈：「英國暫停資本主義模式」。可惜，援助政策出台沒過 2 天，英國民眾的惶恐情緒再度爆發。英國超市到處出現搶購潮。《太陽報》報道，最近三周時間，英國民眾搶購基本生活用品花費達到十億英鎊，導致一些沒有體力搶購的人缺少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

面臨臨時食物短缺

從上周開始，英國三大超市 Sainsbury's、Tesco 和 Asda 進一步設下任何產品每人只能限購三份的規定，基本生活用品如廁紙和洗手液每人限購 2 份，採取如此配額制也是自二戰以來的第一次。超市搶購，除了民眾對新冠病毒恐懼之外，另一個原因是英國食品供應鏈的嚴重脆弱。世界衛生組織顧問、倫敦城市大學食品政策研究者提姆·郎（Tim Lang）教授在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表示，英國雖然沒有進入戰爭狀態，但事實上，英國正面臨着戰時食物的短缺狀態。他說，這才是當下英國的一大麻煩。

提姆·郎教授指出，英國的食物供應鏈非常脆弱，很容易坍塌。英國只能生產英國民眾所需食物的 50%，特殊時期，這就需要國際市場

的施捨才能滿足英國人的需求。如果不是新冠病毒襲來，英國可以花更多的錢來進口更多食品，以滿足民眾營養的各種需求，但一旦進入戰疫狀態，尤其是歐洲多國淪為病毒的淪陷區時，短時間內，英國的食品從何而來？

英國食品供應鏈危機另一個擔憂是，英國民眾所需 90% 的食品控制在英國 8 家公司手裡，尤其是 Tesco 一家獨大，這些公司長期以來藉助價格優勢從歐洲進口食品，而非鼓勵和發展英國本土農業，此舉幾乎廢掉了英國的農產品生產力。提姆·郎教授批評，英國政府總是把自己放在一個預設位置，例如假設別人會一直養活自己。

英國依賴進口食品

英國食品供應鏈的問題，早在英國探討硬脫歐時，就有專家向英國政府提出，但並沒有引起約翰遜政府的重視。甚至英國人還有一種錯覺，我們早在 18 世紀就成為工業國，19 世紀成為主導世界的帝國，我們何愁沒有吃喝？然而，有分析早已指出，早在 20 世紀初期，英國已不再具備自給自足的條件。因為二戰結束，殖民地紛紛獨立，英聯邦在一定程度上解體，從全球範圍徵購或掠奪的條件早已不存在了。

當下英國，相當依賴進口食品，從西班牙進口蔬菜水果、新鮮肉品；從意大利進口酒品、芝士、火腿等等。然而，現在的西班牙、意大利都是疫情深重的地區，伴隨英鎊貶值，進口



倫敦的超市被搶購一空。

新華社

食品價格變貴，英國民眾除了搶購，還有辦法能儲存食物？

政府解決企業員工 80% 的工資，免去企業的增值稅，解決社會救濟問題，可就是沒想到提早解決食品供應的問題。一旦民眾購買食物變得困難，英國就離真正的危機不遠了。這也向脫歐中的英國發出預警：全球化背景下，產業鏈分工明確，且不斷細化，世界早已經形成一個互聯互依的整體，誰想獨立生存，誰必將付出更大的代價。

在全球化背景下，產業鏈像血管一樣，循環於世界肌體內，誰想打破這個存在，誰將付出代價。可貴的是，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時表示，英中兩國有更廣泛的合作需要，特別是透過 3 月 26 日舉行的 G20 視像會議，共享打擊疫情的經驗，提升醫療和供應體系脆弱的國家應對新冠病毒的能力。